

又如，光绪《蓬莱县续志》所附舆图的第一幅便是《奉直东三省北洋海疆图》。大概小区域志书里附大范围海图，是因为“海道所驰，尤为四通八达”，附“不惟于经界之道”的广阔海图，便于因地制宜，至于海防亦可“绸缪永固”。

沙学浚曾以游牧骑兵来比喻海上作战力量的机动性，“海洋权利建立于舰队和航海术上，能在辽阔的海面形成一种具有运动力的作战单位，像游牧民族的骑兵队所表现的一样”^①。海上力量可以随波流动，海防也就没有了相对固定的界限，胡宗宪就对此做过论述：

大海相连，地画有限。若分界以守，则孤围受敌，势弱而危。……若欲调兵剿捕，攻东则窜西，攻南则遁北，急则潜移外境，不能以穷追，缓则旋复合，有难于卒殄。……故福建捕之，而广、浙不捕不可也；广、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②

总之，海防讲求整体防卫，相互配合，宁波外海与舟山群岛海域本身就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海防区域，两者休戚相关。乾隆、光绪《镇海县志》中无《海防图》，《寰海岛屿图》本身就具有海防图的功能，“披图而视，尺幅之间，折冲具有”。因此，宁波与舟山群岛的海防战略地位，可能是乾隆、光绪《镇海县志·寰海岛屿图》未将定海县海域剥离出去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 旧志舆图范式的延续

宝庆《昌国县志》附有一幅《昌国县境图》，元代的方志中未保留下舟山群岛的舆图，明代嘉靖《宁波府志·舟山境图》、嘉靖《定海县志·海境图》最具代表性。

（一）宝庆《昌国县志·昌国县境图》。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孤本宝庆《昌国县志》，卷末有袁克文跋：

《昌国县志》向未见于著录，诸家所藏皆元人《昌国州志》，与此迥异。此钞本甚旧，凡关帝庭都空一格，所原必为宋本，惟辗转传录已失面目，且脱讹杂见为可惜耳。^③

李盛铎曾经收藏过此书，他认为此志当成于宋绍定元年（1228）之后，“又书中语涉宋帝均空格，当从宋本录出”^④。顾志兴则认为此书是宋代王阮纂修的《昌国志》的抄本。^⑤此志内容与宝庆《昌国县志·昌国县志》的内容不尽相同，是舟山市现存最早的专门县志。宝庆《昌国县志》卷首附有《昌国县境图》（见图3）和《昌国县治图》，两幅图也是现存最早的舟山群岛地图。^⑥

① 沙学浚：《南渡时代与西迁时代：中国国防史与国防地理之综合研究》，《学原》1947年第1期。

② 《皇明经世文编》卷267《广福浙兵船当会哨论》，中华书局，1962年，第2825页。

③ 佚名：宝庆《昌国县志》卷末袁克文《跋》，清抄本。

④ 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0页。

⑤ 参见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8—239页。

⑥ 参见谢垂节：《〈昌国县境图〉和〈昌国县治图〉考》，舟山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舟山晚报编：《文史天地》，北京天津出版社，2003年，下册，第1128—1133页。该文附有《昌国县境图》和《昌国县治图》，据文章所述，两图存于宁波市图书馆藏的大德《昌国州图志》卷首，图上标明“宝庆图”和“浙江图书馆补”字样。作者在文中推测两图可能是根据宝庆《昌国县治图》增补，其具体来源不明。文中所附《昌国县境图》与宝庆《昌国县志·昌国县境图》大体一致，仅有几处地名略有不同。

“爰表吾郡四封衡缩险易昭矣，而别图郡治又以示政教之所从出也，属有五邑，邑各有境，境各有治，复图之如郡。而鄞独附郭，不列治图；定海复有威远新城；而舟山故昌国邑治，四周于海，固耕渔之国而鲸鳄之都也，故又别为之图。”^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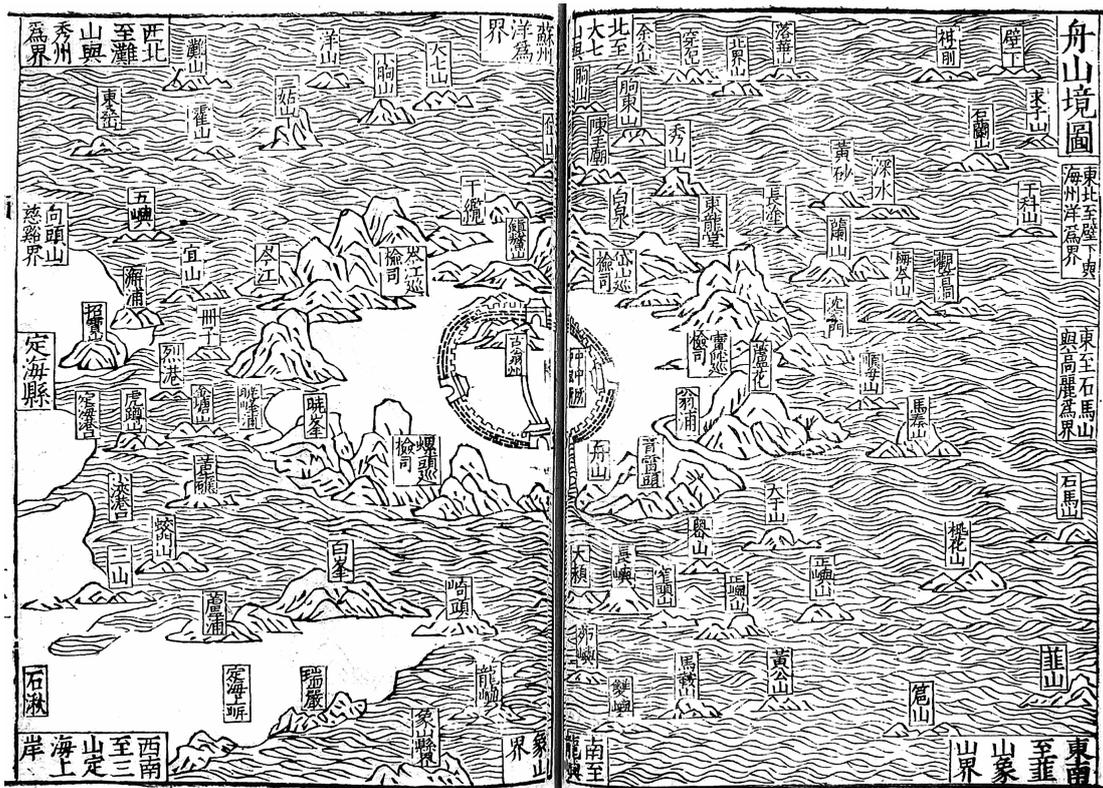


图4 嘉靖《宁波府志·舟山境图》

图中舟山岛上仅绘出城墙，标出“古翁州”和当时设立的中中所、中左所，及岑江、螺头、宝陀、岱山四巡检司等。与宝庆《昌国县志·昌国县境图》相比，除大箬山、大桑山等少数岛屿缺失和“余公山”（可能为“徐公山”的传抄错误）等个别岛屿名称发生变化，其余内容基本相同。一些主要岛屿上的盐场、酒坊、祠院、寺庙、寨台等在《舟山境图》中全部被删除，仅保留岛屿名称。图中标出了舟山的四至八道，基本与宝庆《昌国县志·昌国县境图》中注明的界限一致，其中因政区的改变，西南变为“至三山定海上岸”，删除“西至蛟门与定海县交界”，但依然以“秀州”标注当时的嘉兴府。从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舟山境图》是在宝庆《昌国县志·昌国县境图》的基础上删改而来，内容却简略许多。

（三）嘉靖《定海县志·海境图》。在完成编纂嘉靖《宁波府志》后，张时彻又受邀编纂了《定海县志》，志书卷1有《海境图》一幅，其内容、表现形式与嘉靖《宁波府志·舟山境图》相似，但图中岛屿数量由嘉靖《宁波府志·舟山境图》的50余个，增加到八九十个，不仅补充了六横、普陀、朱家尖、两头洞等重要岛屿，还更正了嘉靖《宁波府志·舟山境图》中的一些内容，如将《舟山境图》中的霍山一岛，改为东霍、西霍两岛。图中还标出诸如孝顺洋、莲花

^① 嘉靖《宁波府志》卷1《舆地图》，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

洋、横水洋、青龙洋等小海区的名字。^① 这些均说明人们对舟山群岛地理认知的进步。图中一些岛礁的名称也有所改变，如将嘉靖《宁波府志·舟山境图》东北的“神前”改为“陈前”，“求子山”改为“求芝”，此应为一地多名所致。^② 何愈的跋中有言：“其志（笔者注：前志）则图舆地而海区弗逮，奚征防御；志疆域而古濠弗理，奚溯河源；……海图有说而防御之策备；河曲有论而洩蓄之术宜……”^③ 我们可以了解到，嘉靖《定海县志·海境图》已经带有十分明显的海防图性质了。

倭寇从明初开始侵扰中国沿海，到嘉靖年间最为严重。当时许栋、王直等盘踞在宁波外海的舟山群岛，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等勾结倭寇，大举进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这场倭患持续至嘉靖四十五年，给浙江、南直隶、山东、福建、广东等地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史称“壬子之变”。嘉靖三十三年，张时彻出任南京兵部尚书，直接领导抗倭行动，后罢官归家。张时彻对倭患和浙东海防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编纂《宁波府志》和《定海县志》时也将这种思考带入志中。《宁波府志·舟山境图》和《定海县志·海境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们绘出了舟山群岛及附近海域岛屿洋面的名称、相对位置等，表现出舟山群岛的大体地理形势。两幅图虽然沿袭宝庆《昌国县志·昌国县境图》的范式，但在当时倭寇横行肆虐的背景下，它们的内容有较大的简化，删除了许多经济地理、文化地理、宗教地理等信息，以便更加清晰地展示舟山群岛的地理形势，突出海防功能，配合志书中所载张时彻的海防建议，则浙东海防策略和态势一目了然。

舟山群岛与宁波的政区隶属关系多有变动，时分时合，但从舆图描绘的范围来讲，自南宋宝庆《昌国县志·昌国县境图》始，至明代嘉靖《宁波府志·舟山境图》、嘉靖《定海县志·海境图》，它们对于舟山群岛的描绘则始终包括舟山群岛及宁波的大部分已知岛屿海域。清代《镇海县志》两幅《寰海岛屿图》不但将镇海县的海域绘出，还绘出舟山群岛全部的海域岛礁，这种做法或是之前方志舆图绘法的延续。另外，清代中后期的方志舆图基本上不再使用地名外加方框的标注方法，乾隆、光绪《镇海县志》中其他舆图的地名均未加方框，而两志所附的《寰海岛屿图》却保留着这种做法，与宝庆《昌国县志·昌国县境图》、嘉靖《宁波府志·舟山境图》、嘉靖《定海县志·海境图》的做法一致，则更加说明清代两部《镇海县志》的《寰海岛屿图》受到旧志中舟山群岛舆图的较大影响。

结 语

乾隆《镇海县志·寰海岛屿图》和光绪《镇海县志·寰海岛屿图》越境而书的原因可能包含了海防需求及明清方志舆图的绘制特点。首先，古人早已认识到舟山群岛与宁波外海在地理位置和海防战略上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论元明定海县、昌国县和清代镇海县、定海县的分合，一个相对完整的宁波外海和舟山群岛海域都是宁波、舟山方志舆图的描绘对象。明清时期，国家的海

① 按，郭永芳认为：“小海区”是古人为了生产、管理的便利，以沿海的港口、河口、山峰、墩汛及海中的岛屿、礁沙等为标志，将我国近海海域划分为单个独立的小单元。这类小海区通常以“海区周围或毗邻陆地名称或岛屿名称来称该海区为某某洋，这种洋有大有小，但大不超过‘海’（指四海）的范围”，如浙江省、福建省外面的海区称为“浙洋”“闽洋”，还有浙江象山港外的小海区“孝顺洋”“乱礁洋”等。参见郭永芳：《中国传统的海上小区——“洋”》，《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1期。

② 按，古代文献中“陈钱山”“神前山”和“求子山”“求芝”经常交替使用，如嘉靖《定海县志》卷5《山川》有述：“陈钱山一名神前。”

③ 嘉靖《定海县志》卷末何愈《重修定海县志后序》，明嘉靖四十二年刊本。

洋政策开始趋于保守，东南沿海的海防形势依然紧张，舟山群岛地理位置险要，不仅是镇海、浙东海域的外部屏障，亦关系到我国整个东南海疆的安全，舟山群岛海防最关键的是要明确众多岛礁的名称、位置等信息，才能够顺利进行巡洋会哨和布防等任务。或出于海防的需要，清代两幅《寰海岛屿图》突破方志越境不书的原则，将镇海县与定海县的海域岛屿绘为一图，或是要凸显舟山群岛的基本地理情况和海防大势。

其次，明清时期方志传抄沿袭的情况时有发生，舆图编绘耗费巨大且对专业技术要求较高，因此方志舆图的沿袭现象更为严重，有些甚至照搬前志舆图。从描绘的区域范围和地名外加方框的标注方式来看，清代两部《镇海县志》所附《寰海岛屿图》沿袭了前代方志对舟山群岛的描绘方式。它们并非完全照抄旧志图，绘图者不但依据当时的地理认知，将图中的岛礁、小海区增加到130余个，还对其中的一些错误信息进行订正。更难能可贵的是，光绪《镇海县志》的编修者可能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想最大可能地遵循方志越境不书的原则，便在图中增加了一道明显的镇海、定海两县海域分界线，以凸显镇海海域与定海海域的区别。

古人将所辖的疆域绘制于图上，称之为“版图”。古代舆图不仅有地理上的表现作用，还是领土主权的象征、疆域管辖的凭证。为应对海上危机，临近的省、府、州、县、营、汛需要通力协作，互为唇齿。但这些省府州县的界限可能将一片完整的海域划分为若干分散的区域；或是为了保持海防的整体性，清代的方志海图时有越境而书的现象，这是对越境不书编纂原则进行的一种因地制宜的权变。

最后，除了方志海图的越境而书现象，清代沿海地区的方志“境图”还有将海境“缩绘”、甚至不绘海境的情况，如康熙《惠州府志·惠州府总图》、康熙《肇庆府志·肇庆府城池四境图》、乾隆《归善县志·县总图》、光绪《福安县志·疆域图》等。此种“缩海而绘”现象在清代的方志境图中较为普遍，或许与统治者的大陆意识和清代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有关。清顺治时期开始对沿海各省实施迁界，“将山东、江、浙、闽、广滨海人民尽迁入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①。之后虽陆续有展界和开禁，但改变不了清代农耕社会的主体和统治阶级的大陆意识。“以海为界”的思想一直存在，如康熙八年（1669）的复界令所述：“议以海为界，修复废毁诸营，听民出田。”^②清代方志境图缩海而绘的现象就是统治者忽视海洋最直接的体现。

清代沿海地区的地方志文字论述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志书中关于海洋地理、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等的描述较少，可以理解为统治者“忽视海洋”；同时，志书中却基本上不乏与海防相关的论述，可以视为统治者重视海防的表现。舆图中缩海而绘和越境而书也正是这两种意识的突出表现。当然，这两种意识并不矛盾，统治者的统治重心在陆不在海，对海洋事务显得“漠不关心”。由于统治者把主要的统治力量用来维护陆地统治秩序，对海洋追求的是“海疆宁谧”，并不希望百姓与海洋接触，更不希望海外力量进入从而扰乱其统治秩序。究其根源，清代统治者的大陆意识是重视海防和忽视海洋这一对矛盾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历史学系）

本文责编：詹利萍

① 夏琳著，林大志校注：《闽海纪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②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1，钦定四库全书本。